

马文宽

1936年8月生于北京，回族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

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被分配到山西省清徐县吴村初级中学等校教书，长达18年有余。1978年底经考核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1983-1989年主持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窑的调查、发掘、资料整理和报告的编写。这使鲜为人知的西夏瓷得以揭示，填补了陶瓷史中的空白。从1990年开始致力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的研究。曾到英、法国进行学术交流。退休后受聘于北京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为研究生讲授“伊斯兰陶器”课程和有关专题。现承担有中国社科院老年科研基金课题项目。

主要著作有《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》(主编)、《宁夏灵武窑》、《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》(主编)、《陶瓷史话》(合著)、《中国陶瓷全集·9·辽夏金》卷(合著)、《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》等。

主要论文有《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及其意义》、《论海上陶瓷之路》、《灵武窑西夏瓷的装饰艺术》、《明代瓷器中伊斯兰因素的考察》、《唐青花瓷研究》、《中国出土和传世的伊斯兰玻璃综述》、《评<蒋祈“陶记”著作时代考辨>》、《明代瓷器与伊朗萨法维陶器的相互影响》、《再论中国青花瓷与伊斯兰青花陶》等。



马文宽访谈

时间：2010年4月26日15：00-17：00

地点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华威西里宿舍楼马文宽研究员住所

对话者：马文宽、董波（《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编辑）

董波（以下简称“董”）：马老，您好，您的研究成果让我受益匪浅！今天是第一次见您，也没带什么东西，这儿有部书，是苏州大学沈爱凤教授托我转送给您的，他的《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——西亚、中亚和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》，上下册。当然这部书出版的时候出了些问题，有很多编辑错误，这儿他配了个勘误表；还有这些地图，由于出版社事先没拿去申报，所以也没有出版。

马文宽（以下简称“马”）：现在几乎是无错不成书！

董：这是我给他写的书评，一万多字，还没发表。我尽量客观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

马：应该这样。

董：这还有篇文章，是我前段时间写的，《中原文物》已经用了，是关于早期白瓷的。

马：哦——“试论早期白瓷中的西域要素”……

董：这是原稿，想请马老多指教。

马：早期白瓷是个好话题。你是从宏观角度谈的，还是微观角度谈的？

董：我是从宏观角度谈的，但也重视具体的例证。其实很多地方，我是学了您的套路，关注的是中外交流——先谈艺术形式，再谈技术，最后谈历史背景。

马：这很好，强调宏观和微观的一种结合。研究白瓷，你首先得宏观把握中国陶瓷史，把握白瓷在陶瓷史上的定位。中国的瓷器，总体上讲是从青瓷到白瓷，再从白瓷到彩瓷和颜色釉瓷。白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事件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。青瓷这个东西固然好，但某种意义上，只有白瓷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瓷器的特色。青瓷之美则表现在造型和似玉的质感。

董：是的，西方人称青瓷为Stoneware，是“炆器”的意思；而瓷器在英语里称为Porcelain，它其实指的是白瓷——还有那些基于白瓷的彩瓷。

马：是啊，如果把彩瓷比作油画的话，那白瓷就好像帆布——没个好的基底，彩绘就很难出效果。古代中国的陶工很想在青瓷上发展彩绘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

董：据我所知，高丽的青瓷喜欢彩饰花纹……

马：哦，高丽青瓷最有特色的是镶嵌彩饰，但就彩绘而言，我觉得青瓷总归没有白瓷潜力大。

董：是的，中国唐、五代时候的长沙窑青瓷，彩绘很发达，但后来就销声匿迹了。

马：不仅长沙窑，在它之前的越窑就开始搞彩绘了，但后来也没搞起来。所以，对于白瓷，你若是从这么一个宏观的角度去认识，你的观点就不一样了。我也曾让一些年轻的陶瓷学者，做一做白瓷研究，但很少有人从青瓷与白瓷的关系来谈这个问题。

董：我这篇文章是从中外交流的角度来谈的，一开头就谈到了青瓷与白瓷的关系，后面又着重分析了技术问题，尤其是釉的问题……

马：嗯，这个问题很重要。中国商代以来的釉，从最早的原始青瓷开始，属于钙釉系统，一直这么下来；到了汉代的时候，又出现了铅釉，两千年来也不断地传承。钙釉是高温釉，而铅釉是低温釉。两种釉相比，铅釉人们以前给低估了。其实对于中国彩瓷的发展来讲，铅釉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。彩瓷中色彩丰富的品种是釉上彩，釉上彩和铅釉的关系就很大。北京的故宫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它“红墙黄瓦”，给人一种震撼感，这里面的“黄瓦”，就是铅釉的功劳。铅釉有两个很大的特点，一是流动性比较大；一个是呈色稳定性比较好。你看故宫的黄瓦，那么多，得是多少窑烧出来的，但是，呈色基本不变。尤其是用在屋顶上的东西，如果从高处或远处一看，色彩东一块西一块，整体气势就没了。

董：不过铅釉是低温釉，而瓷器根本在于它是高温烧成的，中国被西方人称为“瓷国”（china），肯定和中国某种独特的高温烧成工艺有关，马老对这点是怎么理解的？

马：中国的瓷，那是有渊源的。三千年前的商代，就已经有了原始青瓷。对比欧洲，它那儿最早的高温硬质瓷器，要到1709年才在德国生产出来——1710年在麦森（Meissen）建瓷厂，其产品称之为麦森瓷。这么一看，中国制瓷技术领先欧洲三千年。你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

董：我的看法——不知说得对不对，请马老指教——我觉得，古代中国人太善于把握这个世界的“变化”了。比如说“火候”这个概念，就像炒中国菜也是一样的，原材料当然是一方面，但关键还是这个“火候”。所以中国人这点蛮厉害的：很善于把握事物变化的程度——中国有本书叫《易》，“易”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“变化”。

马：你说了一部分，还不够具体。对于瓷器的烧成来说，有两个方面的要素必须考虑。一方面，中国从商代以来，窑炉结构跟欧洲的和西亚的是两个系统。西亚、欧洲，基本上是直烟窑，就是下面是火膛，中间是窑室，烟囱在上面；而中国，甬管是龙窑，还是馒头窑，都是倒烟窑。这一个“直烟”，一个“倒烟”，是决定中国瓷器领先了三千年的重要因素——烟要出去，必须要倒下来，需从后窑墙下面的出烟孔排出窑室，再从后面的烟囱抽出去。

董：烟倒下来，这有什么长处呢？

马：这长处大了！直烟窑，下面烧，热量中间一过，上面马上就被烟囱抽走了，保温不行，它烧不了高温，很难超过一千度，一千度以上，那是很少的，通常也就个七、八百度。

董：但烧出瓷器至少得一千二百度。

马：是呀，只有倒烟窑才能烧到这个温度。你别看，一个“直烟”、一个“倒烟”，看上去很简单，但差别就是这么大！

董：嗯，中国的窑炉结构合理，这是很关键的因素。

马：还有第二方面，那就是西方一直没有找到高岭质粘土和瓷石，他们老是石英岩作为原料。而中国自古就使用高岭质粘土或瓷石来烧瓷。西方人总是会强调高岭土，其实高岭土并不是瓷器诞生的决定因素，它不能单独烧制成瓷器，只是提高瓷器烧成温度和品质的因素。

董：我研究陶瓷史发现，西方的这个麦森瓷和中国瓷器不一样，它有自己的套路。

马：对，是这样，它是受中国瓷器影响发展起来的。不过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展起来的。要说达到中国瓷器的效果，它达到了。

董：我觉得，西方人的烧瓷工艺受他们玻璃工艺影响很大，总体上是基于他们独特的玻璃传统。

马：是呀，就硅酸盐工业来讲，在中国以西的西亚、北非和欧洲，发达的东西是玻璃，那里的玻璃领先世界其它地区四千年！你说说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？

董：玻璃的关键，我觉得和瓷器不同。瓷器的关键刚才马老讲了，首先是窑要好，其次是原料的选择，而玻璃首先依靠的是助熔剂——因为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，熔点特别高，大约一千六百多度，古代的炉子不可能达到这个温度，所以玻璃工艺最关键的技术在于要加入助熔剂。但是中国助熔的套路跟上述西方的情况不一样。

马：配料的问题很重要。中国古代的玻璃器皿拿开水一浇，炸了；西亚、欧洲的没事。这是为什么？

董：对，宋代文献记载，外来的伊斯兰玻璃好像加了“南硼砂”什么的，才能防炸。

马：是的。一般来说，在西亚、北非、欧洲，玻璃文化发达；中国是瓷器文化发达。但西方人到了18世纪以后，充分地利用了他们的传统，用玻璃作主要部件可以制成放大镜、望远镜、显微镜等等。这一下子，使得它的科学研究和机械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！而中国则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点。在清初康熙乾三朝，也是18世纪，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，如套料浮雕玻璃的制造已达世界先进水平。但这些产品只供宫廷帝王们赏玩，仅此而已，没有对玻璃进一步研究。到嘉道以后，我国的玻璃生产就全面落后了。

董：嗯，中国、西方，瓷器、玻璃，得综合起来考虑才行。那马老，您现在退了休以后，主要是在攻那一块研究呢，也转向一些精力研究玻璃了吗？

马：你看，我这样跟你说吧，我60年从北大毕业以后，就一直在农村，劳动和教中小学，一直到78年底，通过苏秉琦先生的推荐和夏鼐先生的考核，我才回到了考古专业。

董：回到？马老以前不是学“历史”的吗？

马：北大历史系的考古专业——确切地讲，是学考古的。

董：那马老您后来就一直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？

马：到退休的时候，是17年多一点。在考古所，你要做事，那首先就得看你的考古发掘，那是你的立足之本。到那儿以后，经过4年多的摸索，我找到了西夏窑址。

董：灵武窑？

马：是的，这个西夏的灵武窑，以前谁也不清楚地知道。冯先铭先生想在他主编的《中国陶瓷史》中写“西夏瓷”，但没有写，因为资料太少。灵武窑在银川南面灵武县城以东的大沙漠中，我在那儿发掘了几年。当时我做了两个题：一个是西夏瓷；还有一个，是外销瓷。外销瓷我为什么要弄呢，我在很多文章里面都已经写了：我看到三上次男先生写的《陶瓷之路》，当时我这心里就不好受。“陶瓷之路”是以运载中国陶瓷为主的海上航路，有着丰富的内涵。然而，首先由一个日本人写成……但真的要我来写，又该怎么写呢？这是个思路的问题，我不懂日文，但看他的书也可以粗略地看出一些脉络。我觉得非洲是一个很典型的地方：非洲这儿，从唐代的时候就进口中国瓷器，宋代……一直到鸦片战争。

董：从东非进去的？

马：东非，还有北非。非洲东北角，从唐代就有。

董：北非唐代就有？

马：不少呢！

董：有人好像专门研究过海上丝绸之路，唐代的航线向西只到波斯湾，不到红海。

马：这里面牵涉到一个转口贸易的问题。从西亚再转口过去——不仅海路，陆路也可以过去。比如你已经到了巴格达了，就可以向西通过巴勒斯坦、西奈半岛、苏伊士地峡进入埃及首府。所以唐代的瓷器，在北非并不少。

董：主要是越窑、邢窑的东西？

马：对，也有几片唐三彩，一些长沙窑和定窑产品。实际上，定窑和邢窑产品非常接近，只是邢窑早一些。唐代的时候，定窑已经有了，而且已经大量外销。比如，三上次男他们看福斯塔特（Fustat，阿拉伯人统治埃及后建立的首个埃及首府，现为开罗老城的一部分）出土的东西，是定窑的还是邢窑的？他们也搞不清楚，咱们现在有些也搞不清楚。总之，在唐代，邢窑和定窑的瓷器都到了非洲。

董：马老师好像写过一本这方面的书。

马：是的——《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》。下一步，我准备就要写西亚……

董：写中国古瓷在西亚的发现？

马：但是我没写，因为后来我在搜集西亚资料的时候，发现了更重要的课题，那就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（中国以西）的文化交流。对于这个问题来说，以前的研究主要在文献上，比如陈垣先生、白寿彝先生……如果还从文献上去研究，肯定赶不上人家这些老先生。

董：马老，这您就该发挥您的强项了……

马：是啊，我就想从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，这样的研究以前很少。退休的这14年里面，我一直写——实际上从1990年开始，我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，也有个20年了。

董：嗯，马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影响很大，您所有的文章，只要是在国内发表的，我都拜读过，还有您的新著……

马：《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》，这本书你有？

董：早就买了！

马：哦，那沈教授有吗？

董：他还没有。

马：那我也送本给他，一会你给带回去。

董：马老的这本书真的很不错！比如这儿——这件素面平沿细颈折肩青瓷纸槌瓶。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就提到它的器形受到了伊斯兰玻璃的影响，但被他们否定了，于是我就不敢写了。当时马老这本书还没出来，要是那时能见到您的书，我就会有反驳他们的底气了。

马：而且我还告诉你，这还不是一个窑在出——而且，出现时间也不长。

董：对，好像到了元代就没了。

马：这模仿伊斯兰玻璃器，那是肯定的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在北大的一个老师齐思和先生，就是原来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。齐先生那个时候给我们讲课，就曾跟我讲：“你现在努力学习，将来只要你的研究成果出来了，别人想阻止，都阻止不了。”就齐先生的这一句话，对我一生都有影响。所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每月除给家里寄的钱，仅剩18块钱生活费，我也不忘了我的考古，按时订阅《考古》和《文物》。

董：齐老先生跟您说的这句话，您现在再告诉我……

马：在任何情况下，不要放弃对自己事业的追求、对学术的追求。那个时候我一提“伊斯兰”三个字，他们就反感，几乎整个学术界都不承认，但是我不为他们所动。可现在呢，经过这20年……

董：大都承认了。

马：当时有人甚至跟我拍桌子说：“瓷器是我们中国的伟大发明，怎么能说受到伊斯兰的影响呢！”

董：影响大了！尤其是彩瓷，确实受到伊斯兰技法的一些影响！

马：可他们的思想受的束缚实在太大了！不睁眼看世界，老是看那么点东西，就不可能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。我在宁夏发掘灵武窑的时候，那也是有点冒险！我去那儿调查了以后，就跟我们的研究室主任汇报，我说“我在宁夏调查了一个窑，是西夏的”，他说“你怎么知道是西夏的？”我说“首先那里的位置离银川不远，银川是西夏的国都，在这西夏王国统治中心的地方，有窑址，而且我发现它的器物有宋代风格，所以很有可能是西夏的窑口。”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推理，你得去证实——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它的器物是不是有宋代风格。当时我们主任就对我说：“你肯定这窑是西夏的吗？”当时我的把握只有80%左右。因为在这之前就那么几件西夏瓷，有人说是元代，有人说是宋代的，有人说与西夏有关。我当时也急需想干点事，不冒点险不行，于是就跟我们主任说：“肯定！”他说“好，我向夏所长（夏鼐）那儿申请去，如果夏所长批准，你就去发掘。”虽然我嘴上说“肯定”，心里还是有点拿不准。当我在那发掘的时候，有人说灵武窑是明代窑址。我在那发掘了一年多了，仍然有人认为是明代的。

董：那他也要给出证据的呀！

马：他们说明代长城所出的瓷器跟这儿一样；另外，最早的灵武县志有一些记载，而那个县志是明代写的。他们这样的推理肯定站不住脚，因为明代县志并不仅记载明代的事；另外，一些粗瓷，特别是碗盘一类延续时间可能很长，在明代民窑器物上也可以出现较早时代的特征。所以我也不管他，就一直坚持，直到后来发掘出有西夏文字和西夏纪年的器物，还出了西夏钱币，我心里才踏实下来。所以搞学术的时候，如果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十拿九稳了再去做，就没啥意思了；没有挑战，搞研究也索然寡味。

董：得有点冒险精神。

马：按部就班，我能做，他也能做，那你有什么呀！做一件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，总会遇到各种困难，但是你怎么去克服？要一直走下去。

在我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，很多人一提到我就说：“他呀，他就啥都是伊斯兰！”

董：哈，我写博士论文时候也是，有些人也说我“啥都是伊斯兰”。其实您还别说，在某些时代，有些东西里面还真是有伊斯兰的因素，或多或少。

马：所以呢，你要真正能研究出来一些东西来的话，别人再说你不行，也否定不了。拿“西夏瓷”来说，开始有些人虽有很不同的观点，发掘完后这些人也都承认这是西夏考古的重要发现了，遗址先后被定为自治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董：我小时候在银川呆过，那儿的人很崇拜西夏。

马：西夏，那是一个很顽强的民族，成吉思汗五次亲自统兵，征服西夏花了很大力气，最后还死在那儿。

董：是的，成吉思汗很看重西夏，他对外战争的第一仗和最后一仗打的都是西夏。

马：当然我是从古陶瓷的角度来谈西夏的……

董：是的，马老绝大多数的成果都在古陶瓷方面。最近，您好像写了几篇文章，是关于刘新园先生的，您提出了很多商榷……

马：是这样的。刘新园先生，我跟他本人没有什么利害关系，只见过几面，没有深交。当然，我们俩的研究有共同的地方，比方说他研究《陶记》，而我在研究伊斯兰的时候，发现伊斯兰文献中也有类似一些有关陶器的记载，叫“阿布尔·卡西姆的论文”，年代和《陶记》也相近，是1301年。

董：阿布尔·卡西姆（Abu’ l Qasim），伊朗卡山（Kashan）的那个？

马：在中古时期卡山是伊朗制陶中心。阿布尔·卡西姆是卡山那儿一个陶工的后代。你要是研究伊斯兰的陶器，必须得研究他的论文，就好比研究中国陶瓷，要研究《陶记》一样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不得不接触到刘新园的一些东西。一开始我倒还觉得无所谓，但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……

董：最后您觉得一定要写点东西了！

马：我写这样的文章，其实也不是很难，在他文章的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，我都做了批注。

董：批的都是错误？

马：大部分是！我把这些批注都统在一起，再加以梳理，核实资料，做好注释就成了文章。这里面，我和他本人没有任何过节。

董：只是就学术论学术。

马：这些错误如果你不给指出来，人家还都以为是正确呢，这就造成了以讹传讹。我们得对当代学术负责，对历史负责，对子孙后代负责！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些文章，当时还是焐在那儿很长时间，就在这桌上，都搁了一、两年呢！我心想发呀还是不发？这你得有一个胆量，就跟我刚才说的“西夏瓷”一样。

董：刘新园毕竟地位在那儿！

马：人家是中国景德镇陶瓷研究第一把手，市政协常委，而且国际有点名。我想如果发了反驳他的文章，他再找我的茬怎么办？我的文章几十篇，里面也会有错啊。

董：是呀。

马：但是我跟你说，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：任何人写文章，从司马迁开始，都可能有些错，主要看有没有硬伤，一般的错误是谁也免不了；再一个，那就是看你的错误是不是受到了时代的局限，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。比如说，陈万里先生把北宋越窑的繁缛刻花青瓷给断为五代。这不是说陈先生本人水平不够，而是因为时代和条件所限，那时几乎没有什么考古资料可资借鉴，是情有可原的。这并无损陈先生的学术地位。

董：所以您就下定决心发表了那些文章。

马：前些日子我问尚刚先生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），我说都几年过去了，他（刘新园）怎么也不反驳？尚刚说：“反驳不了，您那都是从资料基础上给他说的。”

董：尚老师是比较喜欢刘新园的。

马：所以呀，你要批判“大人物”，自己心里要有底。一般错误，谁都能看出来，比如在《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》一书中，对于明代早期的那几件瓷片的断代，90年代就有些人提出不同意见。这可以考虑，可能有几片是定错了。但那也是有资料根据的，可能是对资料的辨识出了问题。但要是资料完全给弄错了，那就是硬伤了。

董：那就没法反驳了。

马：不过我后来又想，即使他再反驳我，给我指出很多缺点、错误，那我就承认了呗！

董：马老您还真有底气！我记得您好像在很多文章里面还提到过一个观点，说您不懂鉴定，也从来不搞鉴定——这可能也会得罪很多人吧！

马：这倒不怕。有很多大学者、大家，都在搞这些个东西，有很多人还得到了很大的实惠。

董：它本质是什么？

马：本质就是钱啦！比如在90年代，有的拍卖公司就托人来找我，说“一月给您两千，您也甭干啥，您就在那儿当个顾问得了”——后来又给我加到三千。我说我不去——你给我三万我也不去，因为我是搞考古的，搞考古的不搞鉴定。

董：哦？鉴定是……

马：跟考古两条路。专门搞鉴定的，靠的是几十年的经验，有一定的思路，一定的方法，有成绩的还应尊重人家；而我们搞考古的，只凭地下所出土的东西来说事。因此这是两条线——搞考古的，其实不懂鉴定，硬要去鉴定，那就会出问题。以前造假的少，造假的水平还不高，现在那就不一样了……

董：全民造假！

马：而且技术很高！人家花了上百万、上千万买了件东西——凭的是有声誉的学术单位、有名望的研究人员开具的鉴定证书——结果买了个假的！你良心过不去呀！

董：您说的让我想到前两天的一件事。复旦大学有位院士叫干福熹，搞光学的。

马：对，干福熹先生，我知道。

董：干老先生现在对科技考古和丝绸之路特别感兴趣，他看到沈爱凤的这本书以后，主动到苏大来交流。当时苏大就有人拿东西给他看，干老却说：“你不要给我单看文物，我只看出土的东西，你的发掘报告在哪？我从来不搞鉴定。”

马：对，我们都一样！其实啊，现在随着科学测年技术的提高，“眼学”应该说是有点落伍了。几十年前搞鉴定，眼力好就行，因为那时仿假的少，仿假的水平也不高。而现在，“眼学”不是说不灵了，起码是不太灵了。但科学完全代替“眼学”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至今我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写过鉴定证书，任何人要我写，我一律拒绝。

董：马老的学术操守……

马：有人就跟我讲，说“别人不能挣钱，你马文宽能挣你不挣！”咱只能说自己不搞这个，就完了。这里面有一个思想境界的问题——有些人说“谁不爱财呀”！

董：这其实是一个市场。

马：是呀，但不能把学术当成市场——我是搞学术的，我不是搞市场的。

董：好的，那马老我们就再回到学术上——您刚才谈到灵武窑，那您觉得灵武窑和磁州窑的关系是什么呢？

马：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它跟整个西夏的发展形势有关。西夏国立国190年，开国前那还有几十年。它的社会在发展，人们对生活用品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。比如，有个饭碗你能吃饭——但木质的容易变形、开裂，只用金属去做那么多饭碗，又没那么多原料。

董：铜铁器皿还容易生锈。

马：为什么说瓷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，是因为它解决了生活中的大问题。在灵武窑之前，西夏和宋朝之间有“榷场”存在，有一些瓷器贸易，但西夏人得到的还是不够。而且“榷场”一会儿开，一会儿关，所以西夏它必然得发展自己的瓷器制造——技术当然是源自宋统治区，主要是陕西和山西一些窑，这些窑后来是被金人控制了。

董：耀州窑、磁州窑？

马：西夏的东面一渡过黄河，到了山西——把山西的一些工匠给虏过去，这说不定。山西就有很多磁州窑系统的剔刻花的東西、黑釉的、白釉的，等等——这样，它就可能受到磁州窑的影响。而在陕西，西夏窑受耀州窑的影响也是有的。灵武窑磁窑堡窑址发现了姜黄釉印花的一些瓷片，但不多——而回民巷窑址，有很多，这些应该受到了耀州窑的影响。

董：那您觉得西夏瓷有没有什么特色呢？

马：白瓷、剔刻花瓷是它的特色；还有造型；釉也很好。

董：应该是上了化妆土的？！

马：白瓷化妆土，这又是一个大的问题！你知道，中国北方的窑和南方的不一样，南方用瓷石作原料，北方不是——北方窑用的原料，都是煤矿夹生层里面的一种高岭泥坩。所以北方瓷窑都在煤窑附近，毫无例外。宋代及以后，基本上用煤来烧窑了，于是一边开煤，一边找土，因此北方大部分白瓷，甬管是邢窑、定窑，除精细瓷外，都是化妆土白瓷，巩县窑也是。

董：化妆土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陶瓷界的一种说法，国际上好像叫“泥浆”。

马：对，泥浆在英语里面叫Slip。

董：我也听过一个词，叫Engobe，这个词是不是单指白色泥浆？

马：Engobe这个词和Slip的基本意思是相同的。Slip指各种颜色的泥浆。Engobe是否单指白色泥浆？还需要查查资料。在中国“化妆土”早在西晋时候，就用在瓷器上了。在西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，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涉入。

董：那您觉得磁州窑的产品和尼沙普尔（Nishapur，伊朗东北部一座著名的古代城市，出产出色的泥浆釉彩陶）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

马：是这样的，化妆土在中国瓷器上主要是白色的，能起到掩盖较暗胎体的作用。真正用到装饰上呢，咱这只有白色的，而在伊斯兰世界，不仅白色，它是各色各样的。中国用两种化妆土的，目前只知磁州窑，用的是白化妆土和黑化妆土或者褐色的化妆土。磁州窑里头最好的东西，那就是先上一层白化妆土，再上一层黑或者褐色的化妆土，然后剔刻花，也不过是白的和黑的或褐色的，两种颜色。而伊斯兰化妆土的颜色那就多啦！

董：比如说尼沙普尔的东西。

马：对，这是东伊朗对伊斯兰世界陶器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——就是泥浆彩的大量运用。而中国陶工总体上没有把泥浆作为一种绘画材料来

用，除了磁州窑的黑白剔刻花。元代也很少，仅见蓝釉白彩瓷、少量的吉州窑瓷及明代漳州窑，但均不是生产主流。

董：那您觉得晚唐的花釉是一种什么东西呢？

马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董：它不是有时候也是“浅色”盖在“深色”上嘛！

马：那不是化妆土的问题，那是“釉”，跟“泥浆”是两回事。用泥浆彩绘以后，再上釉，可以称为“泥浆彩釉”——但这并不是说泥浆本身是釉。

董：用泥浆进行装饰，应该可以叫“泥浆彩”？

马：对，泥浆彩。这种泥浆彩在伊斯兰世界的一些窑是使用的，最早是从东伊朗及临近地区先出现，但在中国，这个很少。

董：那它们之间的关系呢？

马：我在有篇文章里面已经论述了一点，但究竟对不对，这可以探讨。

董：就是“桂林的”那篇（《桂林博物馆藏色釉泥浆彩瓷瓶初探》）

马：对，在《文物春秋》上发的。

董：那谈的是比较晚的东西，是明代的東西。

马：前面谈了宋代磁州窑的黑剔刻花，元代的蓝釉白彩，吉州窑的白花瓷等都是。至于你说，这些泥浆彩瓷和伊朗尼沙普尔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关系？这个应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。噢，想起来了——我写的《伊朗塞尔柱克伊斯兰陶器及与中国瓷器的关系》，那篇你看了吗？

董：没有看过。是刚出的吗？

马：前几年就发在《故宫学刊》上了。

董：我只看过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，没看过您说的“学刊”，要不待会儿……

马：待会儿你复印一下。我在这里面谈了这个泥浆彩的问题，各个方面。但中国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谈的还不是非常的深入。

董：太谢谢啦！马老，我最近还在关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伊斯兰文化对宋代工艺的影响。

马：噢，这种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少——这是比照唐代和元代、明代的情况来说的。因为宋代是强调汉民族本土化的这么一个时代，它的瓷器和唐代、元代的不一樣，是以釉取胜，以造型取胜，至少官方的东西是这样。

董：我正准备写篇文章，叫“南宋官窑中的伊斯兰要素考察”。

马：哦，南宋官窑？倒有些资料。

董：比如刚才我们看的这种纸槌瓶……其实不只纸槌瓶，我排比了一下，大概有三四种瓶子——至少有四种——是仿伊斯兰玻璃器的……同时，还有玲珑瓷的问题。

马：玲珑瓷，我谈过。

董：我看过您的成果——那么，南宋官窑的那种釉上厚了、把器体上镂空的部分盖住了的东西，是不是也算一种玲珑瓷呢？

马：那当然也算。在中国，最早唐代就有玲珑瓷了。

董：洪州窑的那两片？

马：对，余家栋先生他们发现的；刘新园先生，也发现了一片元代的。都不多。这些我在上面的那篇文章谈到了。

董：您在《明代瓷器中的伊斯兰因素的考察》中也谈了这个问题。在这篇文章里面，您还谈了双层器（the Double-walled）的问题，而我发现南宋官窑里面就有不少双层瓷器。噢，对勒，您在《收藏》里面好像发的一篇专门探讨双层器的文章。

马：那是个简化的版本。

董：我在博士论文里面曾经写到这个问题，被他们也否定了。我是后来才看到马老的这篇文章，觉得您也没深谈——是不是因为那个杂志版面有限制？我觉得有点遗憾。

马：那篇文章还发表在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（Musée Guimet）的馆刊上。

董：您现在这儿有吗？

马：有，是法文的。

董：马老懂法文吗？

马：我不懂。

董：这是他们法国人翻译的？

马：是的，内容比《收藏》要多一些。但也不是全文，这是一个遗憾。

董：马老，主要因为我们学报不是核心刊物，档次不够，不然就帮马老发了。

马：你们要发这个，可以！是不是核刊没关系。但是你得写清楚：本文原来的简要版本在《收藏》和吉美馆刊上发表过。

董：那是肯定的。是手写的，还是……

马：你这有U盘吗？

董：电子版的，太好了……